



早期“士”阶层：它的形成、自我意识及原创性

(2007-7-15 17:14:18)

作者：王中江

转载于：《国际儒学研究》第13辑

“知识阶层”（intelligentsia或intellectual）这一名词的出现是相当晚的事。但在东西方，知识阶层的历史都相当悠久。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“士”这一阶层，可以说是中国“知识阶层”比较典型的早期形态。继之，它经历了两汉以后漫长的“士大夫”之“士”历史阶段并在19世纪末开始向“新型知识阶层”转变。如果我们要探讨中国知识阶层的历史，我们最好还是从它的源头出发。这里，我们从中国知识阶层（“士”）的诞生入手，进而讨论一下它的早期特征及“自我意识”。

（一）流动性“士”阶层的诞生

探讨中国“士”阶层的兴起，首先牵涉到“士”的原意问题。在《说文解字》中，许慎对“士”作了一个界定：“士，事也。数始于一，终于十，从十一。孔子曰：推十合一曰士。”段玉裁注解：“引申之，凡能事其事者称士。《白虎通》曰：‘士者，事也，任事之称也。’故《传》曰：‘通古今，辨然否，谓之士。’”按照许、段的解释，“士”字的原义是“事”。而且与人的才智联系在一起。与这种思路接近，吴承仕认为“士”字的原义是指男子在田地耕作。由于“耕作”之事的首要性，故引申为一切“事”之称。林同济强调，在周封建社会中，“士”字的意义就是“事”，即“专门做事”或“做专门事”。把“士”释为“事”，令人费解的地方，是何以从作为“事”的“士”转变为后来作为一种“人”的“士”。与以上解释不同，王国维和郭沫若根据“士”与“雄物”和“阳性”的关系，认为它是指男子；徐中舒把它解释为“官长”，理由是“士”字显示了人端拱而坐的形象；在吴其昌和白川静看来，“士”原为一种武器，引申为主刑狱的官或职掌军律者。与此类似，刘翔认为，“士”字在构形上很像武器，本义表示兵刑，引申为职掌兵刑的官职，进一步泛化为担任官职者的通称。根据战争在远古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首要性，我们倾向于接受“士”字原与武器相关，并由此演变为掌握兵刑的官职。有关“士”字本义的不同认识就回顾到这里，以此作为“士”最初起源的一个知识背景。下面我想从西周时代“士”的意义（引申意义上的）入手，来看一看它是如何转变为春秋战国之“士”的。

我们倾向于认为，春秋中期以前的“士”，作为封建社会的一种身份，他是指贵族阶层中的一个等级，而且是级别比较低的一个等级。这可以从以下的记载中看出。《左传》桓公二年载：“天子建国，诸侯立家，卿置侧室，大夫有贰宗，士有隶子弟，庶人、工、商各有分亲，皆有等衰。”《左传》襄公十四年载：“天子有公，诸侯有卿，卿置侧室，大夫有贰宗，士有朋友，庶人、工、商、阜、隶、牧、圉皆有亲昵，以相辅佐也。……史为书，瞽为诗，工诵箴谏，大夫规诲，士传言，庶人谤，商旅于市，百工献艺。”《左传》昭公七年也载：“天子经略，诸侯正封，古之制也。封略之内，何非君土？食土之毛，谁非君臣？故《诗》曰：‘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’天有十日，人有十等。下所以事上，上所以共神也。故王臣公，公臣大夫，大夫臣士，士臣阜，阜臣舆，舆臣隶，隶臣僚，僚臣仆，仆臣台。马有圉，牛有牧，以待百事。”很明显，在周制中，“士”是与平民最接近的贵族中的最低一个阶层。《孟子·万章下》载孟子指出的周室的爵禄等级是：“君一位，卿一位，大夫一位，上士一位，中士一位，下士一位，凡六等。”《礼记·王制》载：“诸侯之上大夫卿，下大夫，上士、中士、下士。”按照封建等级制，不仅低级别的“士”分有不同等级，大夫也有等级。“士”不仅是封建贵族的一种身份，一种爵位，而且他还担任着“官职”，职掌和从事着各种具体的公共事务。在顾颉刚看来，春秋以前的“士”都是“武士”，只是在经历了春秋中期社会剧烈变动之后才变为“文士”。照此说来，“士”所担任之官都为武官，所从事的事都为“武事”。这可能把“士”的职掌和所从事的工作过于狭隘化了。由于战争频繁，“士”可能都要有战斗方面的训练，以便在战时能够投入作战。但在平时，“士”则从事着具体公共事务及其管理。根据《礼记·曲礼》的记载，商周之官职，都有复杂的设置和分管事务，“士”所职掌的事务并不局限在“武职”和“武事”上。一般来说，在封建统治

阶层中，天子、诸侯，属于最高统治者，卿大夫属于执政者或行政长官，而“士”则属于专门事务的管理者（即“有司”），负责公共行政事务。如，作为封建统治的教养，有关“六艺”的知识和技能，可能是整个统治阶层都需要具备的，但涉及“六艺”的各种具体“事务”或者教学，则要靠“有司”的“士”来担任。其它象卜、筮、礼、乐、祭、医、药、婚、丧、刑罚、土木等都有专人专司。从甲骨文中我们已经能看到一些比较早的官职设置，如掌管宗教祭祀、占卜记录的官巫、史、卜；管理王家仆隶的官“有宰”；管理工匠的官“有工”等。《尚书·洪范》“八政”所说的“祀”，是巫卜官；“食”、“货”是农官；“司徒”是小众人臣；“司空”是工官；“司寇”是刑官；“师”是武官；“宾”是外交官。担任各种具体行政事务的“士”，既是“庶民”的管理者，同时又起着承上的作用。许倬云指出：“世官制度给周人贵族以充分共享政权的机会，史官系统（包括祝宗卜史与乐官）由于其承受知识的圣职性格，成为王朝政府中的专门人材，举凡典故、纪录与档案方面的事务，王室必须仰仗他们的服务。”由于封建官职基本上都是世袭的，所以“士”的职务大致上也沿袭着世代相传（“世承”）的方式传承。要言之，春秋中期之前的“士”，主要有三个基本性格：一是爵禄世袭；二是有战斗训练；三是有专司之职。冯友兰对春秋之前的“士”所作的简明解释可能是恰当的。他说：“知识分子旧日称为士。在西周奴隶主贵族的等级制度中，士是贵族中的最低阶层。他们都受过一些教育，通晓‘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’等‘六艺’。打仗的时候，可以作下级军官；和平时可以作卿大夫高级贵族在政治上的助手。他们过着‘食田’的剥削生活。他们的职守也是世袭的。”

但是，春秋中期以后，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化，封建贵族世袭制被动摇，政治统一共同体受到破坏，即一般所说的“天子失尊”和“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”的局面。这种变化自然也导致了“士”的分化和转变。由于封建贵族世袭制的逐渐解体，作为世袭贵族的“士”，也开始慢慢丧失其固定的身份和爵禄，不再有固定的经济来源——即“恒产”和“食田”。在身份和官职的一体化结构中，“士”的世袭贵族身份的丧失，同时也意味着世袭的固定官职的丧失，正如孟子所说：“士无世官，官事无摄。”这样，原来作为体制性阶层的“士”，就开始转变为“非体制性阶层”的“士”；原来作为世代担任官职的贵族身份的“士”，就转变为“失官”、“失禄”的平民身份的“士”；原来贵族等级中的低级贵族的“士”，转变为“四民”（士农工商）之首的“士”。“士”下降为“民”，失去贵族的身份和官职，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呢？从一方面说，这是身份和地位的失落和危机；但从另一方面说，这也是他们重新塑造自身的一种机会。他们从已有的体制和身份中解放了出来，获得了实现自我的新的方式和可能性。如果说体制、有组织和具有强烈的社会认同，都是知识阶层的麻醉剂的话，那么摆脱体制、组织和控制，越出已有的秩序和认同，则是知识阶层获得活力和创新的机会。时代已经变迁，“士”获得了新的土壤。他们开始了曼海姆所说的自由流动，或成为顾炎武所说的一百多年变化中产生出来的“士无定主”的“游士”。他们不受体制的束缚，超出了已往被限制的专职，角色变得多样化，“君子不器”成为新的理想，何去何从都在他们的选择之中。

“士”的这种转变，从西周的“学在王官”到后来的“学在民间”这种变化中，也可以具体地看出来。如同上述，具有“专学”和“专职”的传统之“士”，都是体制内的官吏，他们有条件去从事“学”，并通过“学”而获得专门的技能。在春秋中期以前的社会结构中，“官”和“师”是合一的，“学”是官府的一部分，它存在于不同的官职中，也就是所说的“学在王官”。“学”被封建贵族所垄断，与庶民无缘。但是，到了春秋以后，天子失去了权威，官学散落。照《左传》昭公十七年所载，就是“天子失官，学在四夷。”“士”流落民间，或者通过他们的学识和教养以求“仕”，即子夏所说的“学而优则仕”；或者安居民间，成为读书人，招收弟子，传道授业，着书立言。如老子曾担任过周之守藏室之“史”，“居周久之，见周之衰”，他就彻底退居民间，立言着书，成了道家学派的创始人。当然，在礼崩乐坏的乱世，“士”不必只有一种选择，他们先后有不同的经历。如孔子曾担任过鲁国司寇，在官位失去后，虽对政治仍具有浓厚的兴趣，但在屡屡受到政治统治者冷遇的情况下，就退而治学，兴办教育，最终成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。在中国思想和文化史上，从“学在王官”到“学在民间”这种“学术空间”的转变，不仅标志着独立知识阶层的兴起，同时也标志着思想和观念的第一次重大“突破”。正是在春秋战国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巨大转变中，从原来的知识共同体来看是“学术”“为天下裂”的局面，但从多元的知识和价值观看，恰恰是塑造了雅斯贝斯所说的“轴心时代”的学术盛况，是自由争鸣的“诸子百家”的兴起。冯友兰描述20世纪初中国政治混乱与学术繁荣的话对此也基本适用，即社会和政治的变动不居，虽然十分不便于人们的实际生活，但却很有利于哲学，因为“哲学总是繁荣于没有教条或规约约束的人类精神自由运动的时代。”在春秋战国时代，王道衰微，政治混乱，诸侯纷争，恰恰为“士”提供了自由思想和价值选择的广大空间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刘歆《七略》的说法，认为“诸子出于王官”，这一说法引起了不少争论。在我们看来，这种说法，如果是强调“诸子”同“王官”的某种联系，是可以接受的。但如果说诸子之学，一一都对应于“王官”

